

## 中东与大国

## 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战略\*

答涛

**摘 要：**土耳其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地区性大国，具备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从历史上看，土耳其的对外战略定位有两条主线：一是向西方靠拢，与西方结盟；二是回归东方，重视区域利益。从1923年建国开始，作为国家统治精英的凯末尔党人就设定了土耳其的“西化”定位，即向欧洲学习，全面地拥抱欧洲文明，但整体上看建国后的二十年间，土耳其对外持守的是一种孤立主义的政策；二战后土耳其实行“一边倒”，投入西方阵营。自1980年代厄扎尔执政以来，土耳其开始调整其对外战略定位，日益强调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土耳其在对外战略上日益向多元化与多维度的格局过渡。21世纪初，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期，土耳其走向多边主义、更加强调全方位平衡的对外战略已基本定型。

**关键词：**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新奥斯曼主义；达乌特奥卢

**作者简介：**答涛，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文章编号：**1673-5161（2015）01-0052-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国家关系研究：历史与现状”的阶段性成果。

2014年中，中东地区陷入“伊斯兰国（ISIS）”<sup>①</sup>所引发的乱局。在打击

① “伊斯兰国”，全称“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是ISIS），是一个自称建国的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

ISIS 的问题上，土耳其表态“很暧昧”，让一些人琢磨不透，土耳其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毕竟它是北约成员国，按理好像应该紧密配合西方的行动。有西方评论家说土耳其不是“合格的”北约成员，而是个“兼职盟友”，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该把土耳其踢出北约了。<sup>①</sup>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尤其是在土耳其当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该如何看待土耳其的对外战略？这是本文要从现代土耳其历史视角尝试回答的问题。

2014 年 8 月，土耳其前总理、前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AKP）主席埃尔多安（Recep Tayip Erdoğan）在该国首次总统直选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以 52% 的得票率获胜，当选为土耳其第 12 任总统。原埃尔多安内阁的外交部长、忠于埃尔多安的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顺势接任了总理职务。土耳其将在 2015 年 6 月举行议会大选。在这期间，达乌特奥卢也面临一系列艰巨的政治任务。据《华盛顿时报》称，“作为正义与发展党领袖，达乌特奥卢的任务首先是在 2015 年 6 月议会选举中获胜，以便埃尔多安修宪；但作为总理，他必须首先挽救土耳其的泡沫经济，并凝聚因埃尔多安政策而日益分裂的土耳其社会。”<sup>②</sup>达乌特奥卢接任埃尔多安，并肩负起将在 2015 年带领正义与发展党赢得议会大选的重任，这意味着正发党主宰土耳其内政外交十余年的政策将得以继续。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土耳其的对外战略是紧紧追随欧美的。但是，正发党上台后，西方观察家开始慨叹“西方正在失去土耳其”，<sup>③</sup>或者说土耳其正改变其亲西方的国家定位，开始“面向东方、背对西方”。2002 年上台并连续执政至今的正发党，被认为是一个表面上亲西方、实则反西方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在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反美情绪的国家，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土耳其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2009 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对亲美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发飙”。土耳其近年来还积极发展与叙利亚、伊朗的关系，尤其积极地介入伊核问题，甚至同情哈马斯<sup>④</sup>等。对于加入欧盟，2005 年启动入盟谈判后，正发党政府似乎已经失去

① Burak Bekdil, *Turkey: What Ally?* <http://www.gatestoneinstitute.org/4715/turkey-ally>; *Is NATO membership shackling Turkey?*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4/10/turkey-nato-polarized-membership.html>.

② 转引自《环球时报》，2014 年 8 月 29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8/5121558.html>。

③ “The Davutoglu Effect: All Change for Foreign Policy,” *Economist*, Oct. 21, 2010.

④ Soner Çağaptay, “The AKP’s Hamas Policy: Transformation of Turk Foreign Policy and the Turk View of the West,” *The FAO Journal*, [www.FAOA.org](http://www.FAOA.org).

了热情。

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似乎已经改变了其传统上“一边倒”式地亲西方的对外战略定位，日益显示出一个地区性“中枢国家”的形象，亦不掩饰其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的企图。<sup>①</sup>简言之，一个不再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土耳其，正在告诉世界，它有一个“大国梦”。本文将围绕两个主题对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进行分析：土耳其对外战略定位的历史规律与特点，以及 21 世纪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

## 一、当代土耳其概况及其地缘地位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的大国，面积 78 万多平方公里，其前身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22 年），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1923 年，在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将军的领导下，土耳其共和国成立。<sup>②</sup>根据土耳其统计署（Türkiye İstatistik Kurumu）的资料，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这个国家的人口已达 7372 万，<sup>③</sup>其人口结构很年轻，<sup>④</sup>99% 的土耳其人都是穆斯林。<sup>⑤</sup>

近年来，土耳其在亚欧大陆“悄然崛起”，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明星。自上世纪 80 年代实行改革以来，土耳其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经济持续较快发展，<sup>⑥</sup>已经成为继“金砖四国”之后的新秀，和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和阿根廷一起被称为“展望五国（VISTA）”。国际学界还提

---

① 和中国类似，土耳其也有一个“百年梦想”。土耳其外交部长达乌特奥卢说，到 2023 年，也就是土耳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土耳其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角色。Ahmet Davutoğlu, “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Insight Turkey*, Vol. 10, No. 1, 2008, p. 96.

② 关于土耳其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参见咎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 年版。

③ 根据土耳其统计署网站资料：[http://www.tuik.gov.tr/PreTablo.do?tb\\_id=39&ust\\_id=11](http://www.tuik.gov.tr/PreTablo.do?tb_id=39&ust_id=11).

④ 根据世界银行 2008 年的数据，土耳其 0-14 岁的人口占 27%，15-64 岁的人口占 67%。

⑤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土耳其 2003~2009 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达到 1.3%

<http://data.worldbank.org/cn/catalog>.

⑥ 在克服 2001 年国内金融危机之后，自 2002 年开始，土耳其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人瞩目，2004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 9%，2005~2007 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5%，2008 年是 3.5%，<http://www.economwatch.com/economic-statistics/country/Turkey/>.

出过“灵猫六国”和“金钻十一国”的概念，这其中都有土耳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土耳其2009年的GDP为6146亿美元，居世界第17位，<sup>①</sup>人均国民收入为8720美元，<sup>②</sup>已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北临俄罗斯，向东是高加索、中亚地区，向西为欧洲，其南与东南是北非、中东，尤其是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当代土耳其外交家、学者、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理达乌特奥卢曾经强调说，21世纪的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中枢国家（central country）。达乌特奥卢指出，冷战之前与之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冷战期间的全球关系网地图上，土耳其被看成是一个边疆国家（Frontier Country），作为北约成员国，它是西方阵营遏制苏联阵营的南大门；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主要被看成是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国家”（Bridge Country）。进入新世纪以来，土耳其追求新的国家定位，逐渐成为一个“中枢国家”，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多区域的身份，是一个不能从某个单一区域的角度来界定的国家，它既是欧洲又是亚洲国家，同时又通过东地中海接近非洲，具有可在几个区域同时运作的功能，故可以被界定为一个中枢国家，而不能将其仅仅视为一个沟通两端的桥梁国家或者边疆国家。达乌特奥卢指出，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也使土耳其成为一个中枢国家。<sup>③</sup>他总结说，作为一个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里海、地中海、海湾以及黑海国家，土耳其应该抛弃其作为边缘国家的定位，并追求一个新的地位——不仅为自己，还要为临近地区提供安全与稳定。也就是说，土耳其应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扮演一种更为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来为其所处地区提供秩序、稳定与安全。达乌特奥卢强调，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就已经开始在这样一个新视野的基础上建构其对外政策。<sup>④</sup>在达乌特奥卢看来，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就在于能否恰当地运用其独特的地缘优势。<sup>⑤</sup>

① 世界银行：《国内生产总值排名》，<http://data.worldbank.org.cn/data-catalog/GDP-ranking-table>。

② 世界银行：《国家一览表》，<http://data.worldbank.org.cn/catalog>。

③ 关于土耳其是一个“中枢国家”的论述，详见 Ahmet Davutoğlu, “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p. 78-79.

④ Ahmet Davutoğlu, “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 79.

⑤ Ahmet Davutoğlu, “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 92.

## 二、“向西还是向东”：从凯末尔党人到厄扎尔

“向西”与“向东”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两条主线。土耳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定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先天具有“向东”或“向西”进行选择的命运与可能。这种选择受到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内是国家统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在外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在近代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欧洲人眼中的“东方问题”，在此情势下，奥斯曼帝国晚期自保和自卫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只能是向东的选择，这种选择主要是反抗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直到共和国建立，土耳其才具有了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对自主性。

二战前，土耳其共和国基本上是维系了一种孤立主义的对外战略。凯末尔党人是一批具有坚定西化倾向的现代主义精英。<sup>①</sup>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面地学习与改革，采纳欧洲文明，并建设一个世俗国家；同时要否定并切断土耳其人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制度和精神方面的联系，尤其是要在土耳其社会中清除伊斯兰教的影响。简言之，凯末尔党人的梦想就是要将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欧洲式的文明国家。此即现代土耳其的国家/文明定位。<sup>②</sup>这样一种国家发展战略选择，最终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即向西方文明靠拢、与欧洲联合，这也是土耳其后来全力谋求加入欧盟的原初动力。不过，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的一段时间，它与西方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主要原因是互相的不信任，以及相互的需要比较少。在凯末尔统治的时代（1923~1938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发展战略重点是改革旧体制、建立健全新的内部结构。在对外关系方面，凯末尔意识到，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新土耳其十分重要。他提出了著名的“国内和平、国际和平”的政策原则，至今土耳其也未偏离这一原则。<sup>③</sup>

---

① 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领导集团包括：军方、总统、外交部、传统官僚、主流政党的高层领导人、以土耳其工商企业联合会为代表的传统的伊斯坦布尔资本集团。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1, (Spring 2002), p. 123.

② 咎涛：《土耳其成为土耳其的道路》，载《法治周末》，2014年9月2日。

③ 具体可以参见埃尔多安于2007年10月27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关于“展望未来”的演讲，收入 R. Tayyip Erdoğan, *Küresel Barış Vizyonu*, İstanbul: Medeniyetler İttifakı Yayınları, 2012, s.109.

二战后，土耳其改变了其孤立主义的对外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直到大战快结束，才审时度势加入到同盟国阵营。在冷战格局下，土耳其日益感受到来自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的威胁，遂决定实行对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军事力量南下的前哨。土全面接受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执行的是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sup>①</sup>

冷战期间，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主导土耳其外交的是军方和外交部，这两个部门主要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所控制。这些精英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唯一选择就是与西方结盟。推动凯末尔党人与西方结盟的重要因素是：传统的西方主义定位和持续的内外威胁。内部威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和社会主义运动。<sup>②</sup>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呈现如下特征：（1）避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阿以之间的纠纷，以及两伊战争这样的地区冲突；（2）历届政府较为成功地保持着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友好但并不亲近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因为边境省份哈塔伊的归属问题而不睦）；（3）除了在 1955 年加入《巴格达条约》，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持不积极的、低调的姿态；（4）是当时唯一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sup>③</sup>

总之，凯末尔主义统治精英主导下的土耳其对外战略，似乎非常简单：“自从凯末尔将土耳其领入现代世界，这个国家就偏向于西方。他赶跑了苏丹，采用拉丁字母，废除了穆斯林哈里发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 1952 年加入了北约，支持西方对抗苏联的政策，渴望融入欧洲事务之中。像美国一样，土耳其也一贯支持以色列。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忽视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其中大多数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sup>④</sup>

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商、军、官、学精英集团所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

---

① 1949 年 8 月 10 日，土耳其加入欧洲议会，1950 年 8 月 1 日，土耳其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2 年 2 月，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了加入北约，赴朝鲜作战算是土耳其的投名状。

②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 129.

③ Sabri Sayari,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6, No. 3 (Spring, 1997), pp. 44-56.

④ “The Davutoglu Effect: All Change for Foreign Policy,” *Economist*, Oct., 21st, 2010.

略定位，只是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Turgut Özal，1983~1989 年任土耳其总理，1989~1993 年任总统）才正式地受到挑战。<sup>①</sup>厄扎尔的时代，既是土内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过渡时期，尤其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正逢冷战结束，国际局势的剧变也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厄扎尔改变原有的政策，谨慎地冒险，寻找新的可替代性选择，加强多边合作。<sup>②</sup>厄扎尔寻求从对西方的依附转变为与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密切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厄扎尔采取的是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执行的是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

厄扎尔特别重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与对传统价值观的强调，使其更加重视中东—伊斯兰世界。厄扎尔的目标是要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积极地调停巴以冲突；在两伊战争中，土耳其持“积极中立”的态度，从两方面大量获益。土耳其还积极参加伊斯兰组织，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支持，厄扎尔鼓励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加强宗教活动。在海湾战争时，厄扎尔批评了北约对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强调自己独特的价值观。<sup>③</sup>

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厄扎尔更加强调土耳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为了提高土耳其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厄扎尔谋求改变和提升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的角色，他强调土耳其应同时与美国和欧盟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其中的一方。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厄扎尔并未将完全成员国地位作为最终目的，这是其与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不同。厄扎尔主要地是将欧盟视为土耳其的一个经济利益。他其实很清楚，欧盟对土耳其有宗教和历史的偏见。厄扎尔也改变了与美国关系中过于强调军事方面的倾向，力图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实现多元化，尤其强调经济、自由贸易和科技合作等方面。<sup>④</sup>

总之，厄扎尔时代的外交政策调整奠定了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础。

---

①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p. 122.

②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pp. 131-132.

③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p. 133.

④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p. 144.

### 三、达乌特奥卢：21 世纪的新奥斯曼主义者

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 20 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即以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以 1991 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sup>①</sup>按照这种逻辑划分，21 世纪的开端也就是“后冷战”时代的开始。从土耳其的角度看，后冷战时代有如下几个特点：（1）从东-西方的冲突转变为南-北问题；（2）民族与宗教问题成为新世纪冲突的核心因素；（3）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冲突也具有特殊地位；（4）两极世界转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在单极格局下，中等力量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自主性，对土耳其来说，就是真正地开始从“消极中立”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地区性角色。<sup>②</sup>

1993 年厄扎尔去世，厄扎尔时代开辟的内外战略一度停止，凯末尔主义者重获权力，并放弃了在中东地区的“平衡外交政策”，从伊斯兰世界退缩，与以色列建立起战略、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重新回归到在地区事务中过去的那种亲西方路线。也就是说，后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短暂地回归到了传统凯末尔主义时代的孤立状态。<sup>③</sup>

然而，近二十年来的历史证明，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回归。厄扎尔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被正发党政府所继承与发扬，并被更为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主张。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人，他就是土耳其的“基辛格式的外交家”——达乌特奥卢。达乌特奥卢说过，他非常赞赏厄扎尔时代，认为厄扎尔是一个有见解、有长远目光的人，他强调，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应该注意总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教训，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sup>④</sup>

达乌特奥卢是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在 2001 年出版了一本著作——《战略的纵深》（*Stratejik Derinlik*）<sup>⑤</sup>，该书力图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

①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安东尼奥·波立陶：《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等译，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 页。

② Ziya Öniş, “Turke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Search of Identity,” *Middle East Journal*, 49:1 (1995: Winter), p. 50.

③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 149.

④ 根据达乌特奥卢在“第七届中东技术大学国际关系会议”上的讲话。“THE SEVENTH METU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kara, June 18-20, 2008.

⑤ Ahmet Davutoglu, *Stratejik Derinlik*, Kure Yayinlari, 2009. 据称作者本人不愿此书被译成西文。

规划一个新的路线图。他认为，土耳其长期以来否定了其奥斯曼帝国的过去，以及与邻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因此，安卡拉将自身与其周边孤立起来了。但仍然有一个在那里的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而要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必须转变思维。这一对外战略的思维转变，伴随着正发党的上台而开始。塔石珀纳尔（Ömer Taşpınar）称这一转变是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新奥斯曼主义，就是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sup>①</sup>“战略的纵深”意味着要加强土耳其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达乌特奥卢说：“土耳其与西方传统上的紧密关系，代表的是一种疏离过程”；“自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穆斯林一直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正发党就是要纠正这一切。”<sup>②</sup>

达乌特奥卢还是一个典型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根据达乌特奥卢的看法，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而且还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或许，这在一段时期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西方确实曾经是历史的主要发动机，“但是，在一个中国已经逐渐崛起的时代，你再也不能用完全是西方式的范式来考虑世界了。”达乌特奥卢说，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可分享的全球政治秩序”（a participatory global political order）。<sup>③</sup>

亨廷顿曾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无所适从的、身份撕裂的国家（a torn country），<sup>④</sup>而达乌特奥卢认为，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由此，土耳其就是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sup>⑤</sup>

达乌特奥卢为土耳其新的对外战略制定了五个基本原则：（1）强调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是相互促进的，民主制是土耳其拥有的软实力；（2）与邻国的“零问题政策”（zero problem policy）；（3）不仅与临近地区发展关系，还要

---

① Mustafa Akyol, “Footnotes to History from ‘Turkey’s Kissinger’,” *Turkish Daily News*, November 1, 2008. 关于新奥斯曼主义，还可以参见“谁的土耳其？答涛谈新奥斯曼主义”，<http://news.163.com/14/1103/21/AA5GQ11O00014SEH.html>，2014年12月30日。

② Soner Cagaptay, “Turkey under the AKP: Neither a European nor a Regional Power (Part 2),” *Hurriyet Daily News*, October 10, 2010.

③ Mustafa Akyol, “Footnotes to History from ‘Turkey’s Kissinger’ .”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 1998 年版，第 153~160 页。

⑤ Mustafa Akyol, “Footnotes to History from ‘Turkey’s Kissinger’ .”

与更远的地区发展关系；(4) 坚持多维度的外交政策，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5) 实践有节奏的外交 (rhythmic diplomacy)，即强调对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参与，并在其中建立和强化土耳其的影响力。比如：对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参与；介入伊核问题、阿以问题等。<sup>①</sup>关于土耳其对中东的政策，达乌特奥卢强调了四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强调对话；经济共荣；文化并存与多样性。<sup>②</sup>

在 2008 年的一次国际关系会议上，达乌特奥卢比较简洁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土耳其当前正处于外交的转型期，理解和展望土耳其未来的外交和国际政治，必须同时注意到时、空条件，时间是世界和土耳其历史的演变过程，空间则是指土耳其所面临的周边环境的变化。20 世纪末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新视野出现的时期，特别是在 1989 年之后，需要的是重新定位，特别是在空间上的重新定位。土耳其必须同时重视与自身相关的三个空间：超民族的国家、地区性的国家以及中枢国家。

达乌特奥卢认为，当前世界正处于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时代，人力资源和金融的流动超出想象。但同时，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文化的边界日益明显，各种边界在土耳其这里交汇。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必须找到自己的空间定位。达乌特奥卢提出的定位是，土耳其必须成为一个“积极的角色” (active actor)：一方面是自保，另一方面是要把上述空间条件充分考虑到。达乌特奥卢强调，地缘政治既与内政密切相关，也与一些不可或缺的价值 (indispensable values) 有关。土耳其的潜力在于用多元文明的软实力沟通欧盟与中东，这种实力是土耳其独有的，且必须使用这种实力促成未来合作之可能。但是，土耳其也面临很多问题，包括长期和短期的。21 世纪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重新定位的时期。<sup>③</sup>

## 四、结语

### (一) 内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共同促成了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

影响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是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内部是统治精英的转变，外部是土耳其所处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从 1980 年代开始，土耳其内政经历了重大变化，简单来说就是，传统的

① Ahmet Davutoğlu, "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p. 79~82.

② Ahmet Davutoğlu, "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 84.

③ 根据达乌特奥卢在“第七届中东技术大学国际关系会议”上的讲话。

凯末尔主义精英相对于厄扎尔领导集团开始日益处于从属地位。厄扎尔的支持者是安纳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保守的政治和社会集团,而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相对被边缘化了。这一时期,土耳其逐渐放弃了凯末尔党人坚持多年的国家主义,并改变了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一些内容,尤其是摧毁了很多凯末尔时代的禁忌。厄扎尔时代的意识形态是:“技术西化+土耳其主义+伊斯兰主义”。土耳其学者将这种意识形态概括为“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Turkish-Islam Synthesis),根据这一意识形态,土耳其只有同时奉行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才能期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强有力的地位。体现在对外战略上,这就是“双泛”(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合一。也就是说,厄扎尔在意识形态上复兴了奥斯曼和伊斯兰的文化遗产;另外,厄扎尔还强调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以自由化促现代化。但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宣称,厄扎尔是个“伊斯兰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sup>①</sup>

土耳其建国八十多年以来,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概括来讲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 1980—1990 年代的厄扎尔时代,并随着 2002 年正发党的上台而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手中。<sup>②</sup>土耳其内政上的这一重要转变,影响到了其对外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强调整伊斯兰认同、强调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从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对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影响最大的是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土耳其对于欧洲的防卫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阵营的边疆国家,一个还没有真正进入欧洲俱乐部的土耳其,必然面临重建自身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

---

①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p. 126.

② 在正发党的领导之下,土耳其正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姿态融入世界。土耳其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内部的变化往往是其在加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逐渐予以调适的;伊斯兰与现代性之间是可以实现共融的。在 ISIS 兴起于中东的今天,埃尔多安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有的人提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仿佛伊斯兰世界盲目地、狂热地并整体地要与西方敌对;也有人把伊斯兰教只是与恐怖主义等同,并昧着良心地去制造一种全球性的伊斯兰恐惧症。不管是谁以什么名义,我们都坚决地反对这些做法。” R. Tayyip Erdoğan, *Küresel Barış Vizyonu*, İstanbul: Medeniyetler İttifakı Yayınları, 2012, p. 24.

故意刁难，不接受土耳其为欧盟的完全成员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耳其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sup>①</sup>

## （二）土耳其并未抛弃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

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厄扎尔调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没有忽视加强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其目的是要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借助于这种合作来平衡土耳其国内的凯末尔主义反对派。多元化、多边主义其实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兰倾向、地区倾向和东方倾向。这一点对当前的正发党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

## （三）土耳其的“大国梦”受制于其综合国力的有限性

从厄扎尔到正发党时代，土耳其在二十年间基本上完成了国家重新定位，以及对外战略的调整。这个调整里面还蕴含着土耳其的一个“大国梦”，用达乌特奥卢的话来说就是，土耳其首先要成为一个同时具备软硬两方面实力的地区性大国，进而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力量。

有一种对达乌特奥卢的批评值得重视，即他可能过早地把土耳其看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力量，比如，土耳其过于积极地介入阿以冲突、 Hamas问题、伊核问题等国际性的重要议程，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实际利益。土耳其的现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只是，现在土耳其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确实容易给土耳其人以更大的信心。

以土耳其在中亚的政策为例，土耳其在这里尽管以泛突厥主义的文化 and 土耳其模式作为软实力来谋求更多更大的利益，甚至表现出明显地要取代苏联当一个新的“老大哥”的姿态，但中亚国家也清醒地意识到，土耳其的抱负远远超出了它的实力，与周边的俄、中两个大国相比，土耳其所能提供的实际援助和支持，远远无法满足中亚诸国的需求。<sup>②</sup>另外，土耳其还面临国内和地区层

---

① Emrullah Uslu, “Ahmet Davutoglu: The Man Behind Turkey’s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6, Issue 57, March 25, 2009. <http://acturca.wordpress.com/2009/03/25/ahmet-davutoglu-the-man-behind-turkeys-assertive-foreign-policy/>

② Nasuh Uslu, “The Russian, Caucasian and Central Asian Aspects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 Cold War Period,”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3&4, 2003, pp. 181-183.

管涛：“从历史的角度看双泛”，高全喜：《大观》，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106页。

面上库尔德问题的严峻挑战。<sup>①</sup>

#### (四) 土耳其国内和国外都有对正发党伊斯兰主义的批评

现在，土耳其国内外都存在对正发党这个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怀疑。尽管它宣称拥护世俗主义和自由民主，但是，它在掌握了行政大权之后，利用官方的和民间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利用欧盟进程（作为外部压力），<sup>②</sup>利用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利用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对军队进行污名化，并使其变成了“纸老虎”。有学者质疑说，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自由社会。<sup>③</sup>同样地，批评者认为，正发党的对外政策受到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不是建立在理性考量、土耳其的综合国力以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sup>④</sup>当然这些说法也遭到了质疑，因为，从表现上来看，正发党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是以维护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为导向的。<sup>⑤</sup>

#### (五) 中亚：土耳其与中国的交集<sup>⑥</sup>

今天，中国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设想。<sup>⑦</sup>这就同时提出了与中央欧亚大陆上的国家进行新型合作的时代课题，土耳其正是欧亚大路上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的区域性大国。“在很多方面，土耳其已经符合一个地区性大国的标准。”<sup>⑧</sup>相比于中国，土耳其的影响力主要是在软实力方面。如凯伊曼（E. Fuat Keyman）教授所言，尽管土耳其没有能力在中东地区推行政权更迭，但是，“土耳其是一个有相当能力通过软实力达到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实现变革的国家，其贡献将包括对善治和民主政府的建立，对经济发展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sup>⑨</sup>根据一项土耳其智库所做的研究，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不同，土耳其“从软实力视角看起来尤为重要和有效”。“这一能力体现在三个明显的方面，即国

① 咎涛：《奥斯曼帝国崩溃了，中国却没有》，载《东方早报》，2014年11月16日。

② 李鹏涛：《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对欧洲态度的转变》，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4期，第76~77页。

③ Soner Cagaptay, “Turkey’s New ‘Old Kemalists,’” *Hurriyet News*, March 20, 2011.

④ Damla Aras, “Turkey’s Ambassadors vs. Erdoğan,”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11, p. 57.

⑤ 《咎涛谈土耳其模式》，载《东方早报》，2014年9月21日。

⑥ 关于中亚对中国的意义，详见咎涛：《地缘与文明：建立中国对中亚的常识性认知》，高全喜主编《大观》，法律出版社2011版，第110~139页。

⑦ 《习近平呼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http://news.sina.com.cn/c/2013-09-07/134628157661.shtml> .

⑧ Sinan Ulgen, *A Place in the Sun or Fifteen Minutes of Fame? Understanding Turkey’s New Foreign Policy*, Carnegie Papers, Carnegie Europ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 1, December 2010, p. 5.

⑨ E. Fuat Keyman, “Rethinking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urkish Weekly*, 27 May 2013.

家建设领域、民族建构领域、建立经济发展和动力机制领域。<sup>①</sup>

土耳其在中亚的广泛影响力正是通过软实力实现的。在这个方面，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历史联系被广泛地运用。其中，最具潜在影响力的是土耳其作为一个对广大中亚穆斯林具有吸引力的模式，尤其是影响到了大中亚地区诸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sup>②</sup>土耳其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小兄弟”。尽管正发党时代的土耳其官方宣称放弃了泛突厥主义或者“突厥语世界的统一”这样的诉求，但它在中亚的影响力仍然是很大的。

最近，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建立了在伊斯兰教育方面的密切合作，<sup>③</sup>这本身也是土耳其在中亚穆斯林中具有软实力的表现和证明。“中国对这一地区好战教义影响主流穆斯林的现象感到不安，不管这样的思想是来自邻近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是沙特的激进的瓦哈比主义。他们视土耳其版本的专注于精神的、内省的与平和的伊斯兰教义为对抗极端主义的屏障。”<sup>④</sup>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上升到对所谓“土耳其式”伊斯兰教这个问题的探讨。<sup>⑤</sup>一般认为，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是相对世俗和温和的。在有关居兰运动（Gülen Movement）的研究中，这个问题经常被提出来。<sup>⑥</sup>

纵观土耳其共和国八十多年的历史，它的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现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回归到东方伊斯兰世界，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对他们来说，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是亲西方的。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了。<sup>⑦</sup>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土耳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形势下寻求一种新的国

---

① E. Fuat Keyman, “Rethinking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urkish Weekly*, 27 May 2013.

② 咎涛：《土耳其模式：历史与现实》，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③ “Çin'den İmam hatiplere öğrenci,” <http://www.ihf.com.tr/egitim/cin-den-imam-hatiplere-ogrenci/160687>.

④ *Today's Zaman*, 1 April 2012.

⑤ 理论上讲，这就是人类学大师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曾经探讨的问题，即作为“世界宗教”的伊斯兰教如何在不同的背景中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影响和自我实现。参见刘琪：《族群归属与社区生活——对一个云南小镇“藏回”群体的人类学研究》，载《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第34页。

⑥ Yavuz and Esposito, ed., *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 the Gülen Movement*, Syracuse Uni. Press, 2003; 咎涛：《居兰与伊斯兰复兴运动》，载《党政论坛》，2009年第9期。

⑦ 达乌特奥卢曾明确地否认他的外交战略是在疏远西方。Emrullah Uslu, “Ahmet Davutoglu: The Man Behind Turkey's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

家认同和对外战略，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关键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土耳其的这种对外战略调整，尤其是对当前正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现在看起来，它更多地植根于对土耳其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单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

随着 2014 年 8 月埃尔多安当选为土耳其总统，并在理论上脱离正发党<sup>①</sup>，正发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它是否还能够作为第一大党赢得议会选举，并继续执政？甚至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力量帮助埃尔多安实现土耳其向总统制的转型？很快地，这些问题都将见分晓。但从我们的分析，从土耳其的长期历史发展来看，“一边倒”式地亲西方的对外战略已经根本性地得到了纠正，土耳其当然还会是西方的盟友，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维系其作为西方特殊盟友的地位和关系，但土耳其再也不是那个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小伙伴了，无论是哪一个政党上台，土耳其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都不会被根本性地逆转，今天的土耳其已经走向并建立起了多边主义。

## A Historical Analysis on Turkey's Multilateralism of Foreign Strategy

ZAN Tao

(Zan Ta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urkey is a medium-sized regional power. Historically, since 1945, modern Turkey had two types of foreign policies: pro-West and making balance between West and East. By 1980s, Turkey maintained a strong pro-West stance. By putting more emphasis on regional affairs and interests, and by establishing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newly independent Central Asian states, Turgut Ozal's rule opened a new phase in Turkey's foreign policy, balancing pro-West by returning to the East. Continuing and inheriting Turgut Ozal's policy and legacy, AKP's Turkish government has forged a multi-dimensional foreign strategy.

**Key Words** Turkey; AKP; Ahmet Davutoglu; Neo-Ottomanism

(责任编辑：李 意)

---

①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土耳其总统是中立性的国家元首，不属于任何政党。